

知名刑法专家刘宪权连续 20 年获评华政“我心目中的最佳教师”，听课学生从 50 后到 00 后

“明星教授”最留恋的地方是课堂

■本报记者 樊丽萍

华东政法大学教授、沪上知名刑法专家刘宪权，日前迎来了教师职业生涯的“高光”时刻：11月28日晚，在华政第24届“我心目中的最佳教师”评选中，他以2549票的最高票当选。这也是刘宪权连续20年被华政学生评为“我心目中的最佳教师”。

全国先进工作者、首批国家“万人计划”入选者、国家级教学名师、上海市教育功臣、全国优秀教师、上海市教书育人楷模……从教35年，刘宪权获得的奖项和荣誉称号数不胜数，但他自己最在乎、最看重的，却是这个全校学生经过海选投票评出的奖项。在华政，刘宪权被学生们亲切地称为“宪哥”，甚至被称为“华政一哥”。上过刘宪权课的学生，从50后、60后直到如今的90后、00后。

“没有上过宪哥的刑法课，大学生活不完整。”这句话在华政口耳相传、人尽皆知。这段在一代代学生中流传的佳话，可以说是一种学风和校风的传承：重视本科生、重视本科生教学，好的大学理应如此，好的老师理应如此。



对本科课堂的“痴迷”，常人难以想象

的知名教授，他对本科课堂的“痴迷”，常人难以想象。

每周，他给学生上八节课，往往天蒙蒙亮，这位年逾六旬的教授就从市区的家中出发，赶到六十公里外的松江校区。刮风下雨，从不迟到，更不会缺席。

因为选课的学生实在太多，他的课有时不得不上午讲一遍，下午再讲一遍。尽管一部刑法在他心里已滚瓜烂熟，但刘宪权的“每堂课都不一样”，因为上课的学生不同，外面的世界更是在不停变化，刑法课也必须“与时俱进”。故此，每次上课前，他

都要花时间备课，精选案例。

“宪哥”的课好听，在华政是公认的。现为华政本科大四学生的余越洋，也是“蹭课大军”中的一员。问及每次都早起占座的动力是什么，余越洋说，刘老师的幽默风趣和温文儒雅有着奇特的吸引力。

“什么时候讲理论，什么时候讲案例，如何穿插效果更好，这些教案都经过了精心设计。”刘宪权讲到如何上好一堂课，总有一肚子话要说，这也是他最喜欢和青年教师谈论的话题。上过“宪哥”刑法课的学生还会发现一个有趣的事情。尽管教室人

爆棚，十分拥挤，但只要有可能挪步，刘宪权总喜欢在教室里“兜圈子”，踱着步子一边走、一边提问，并随时把麦克风递给学生，请他们回答问题。有时候，学生的答案思路明显走偏了，“宪哥”会不依不饶，像在法庭辩论一样“盘问”学生，或者干脆发起一场讨论，直到学生意识到问题所在。因为每堂课总是人气很足，耗能很大，所以无论是冬天还是夏天，一堂课上下来，“宪哥”总是满头大汗。

“本科教育是人才培养最重要和打基础的阶段，如不重视，高等教育就没前途。”刘宪权在很多场合不止一次说过，大学老师给本科生上课是本分，这份工作必须要做好。“再大牌的教授，都要不忘初心，不能忘‘本’。”

估总结会上表示，刘宪权教授的课是他听过的最好的课，刘老师的课讲得“炉火纯青”，在当今法学界极为罕见。

华政“我心目中的最佳教师”评选共进行过24届，刘宪权连拿了20届（1999年-2018年），前四届因工作关系，他没在学校开课，因此缺席。这是对年均3000门（次）课程的550余名专业教师的评价和票选，刘宪权连续20年上榜，开创了华政的历史先河，创造了华政的“吉尼斯纪录”。

这个奖完全由学生投票产生，奖品只是一个奖牌或奖杯，可这恰恰最能体现教学的魅力。刘宪权说，连拿20届“我心目中的最佳教师”，不仅需要体力支撑，更是一种自我加压，这种“压力”成为激励他不断努力与进步的动力。

教学科研相长，学习工作全年无休

有人说，高校中擅长教学的老师，通常都不擅长科研。可刘宪权是一个例外。

这位教学名师在科研领域也硕果累累。多年来，他始终活跃在刑法学研究前沿，先后出版学术著作50余部，在核心期刊发表论文数百篇，主持的一项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和三项目一般项目，得到了国内外专家的认可，产生了良好的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他连续九年入选“中国法学高产作者”，实现自评选以来全国范围内为数不多的“超高产作者”大满贯。

在刘宪权看来，科研与教学的不同之处在于，教学代表学校内部的认可，而科研直接关系到学校外部的认可。他也在不断思考：如何让科研与课堂相互推动，通过科研让教学始终跟上社会的发展。而课堂上，学生们的回答常常能启发他找到研究刑法问题的新见解。当然，刘宪权更希望学生能够向他，这样的提问会促使自己发现新问题，很多学生思维的闪光点成了他教学与科研上很好的借鉴。

作为学科带头人，刘宪权多方统筹、整合资源，短短数年内，把华政刑法学科建设成为南方首屈一指、全国名列前茅，在全国具有重大影响力

的上海市重点学科和上海市高校一流学科，尤其是在经济刑法、金融刑法、互联网及人工智能犯罪等领域，华政处于全国领先和强势地位。

如今，在业界已是重量级人物的刘宪权依然是个“拼命三郎”。他期待自己80岁时，能像一些著名法学家那样，还在写作治学，成为学界泰斗。

刘宪权有一个体会：读书是不吃力的。所以他从未间断过学习，哪怕再忙再累，都要做好学问。他的办公室位于古老的华政东凤楼，简朴、通透、大气，硕大的书桌与书柜卫士般守护着他。只要没课，没有学术活动，他一定会坐在这里看书。学生们都知道，节假日里都可以在办公室找到他。

一年到头，刘宪权只给自己放半天春节假期，这段时间他要去看望家人，其余时间他都在工作，没日没夜地带着学生搞课题、改论文、做研究。

“名师不名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兢兢业业工作、勤勤恳恳做人，认认真真教书、踏踏实实育人。”刘宪权说，学生需要的并不是什么模范、名师，只是一位实实在在教好他们的老师。信其师，才能信其道，这正是师德的体现，这样的老师也将影响学生一辈子。

通识教育≠技能整合教育

大学实践中，专业与通用之间矛盾重重

■本报记者 姜澎

在中国，大学里的通识教育仍在完善之中，但在美国等发达国家，通识教育却面临革新。越来越多的人认为，通识教育在如今的大学已成为实用知识和

技能的整合，不再符合其追求知识深度和广度的初衷。在复旦大学日前主办的通识教育研讨会上，虽然国内外学者认为中国和发达国家的通识教育发展有所不同，但面临的问题却是相同的：通识教育要解决实践与知识之间的鸿沟，却又不能沦为技能的整合教育。

传统通识教育陷入发展瓶颈

一面是通识教育越来越重视实用技能，一面却是越来越多的毕业生在雇主眼中“并不具备值得重视的技能”，这种反差究竟是如何发生的？

在论坛上，美国学院与大学协会副主席特瑞尔·罗德斯说，通识教育是大学本科教育的重要内容。

通识教育的本质意味着它并不以传授实用技能为主要目的，它要使学生获得的，是那些可以迁移的、基本的技能。但在过去几年中，美国学者发现，大学里的通识教育正变得越来越实用，甚至不少大学的通识教育课程已在偏向实用技能。

为了检验通识教育是否符合初衷，美国学院与大学协会于2016年对全美雇主进行了调查，了解他们对大学毕业生的看法。结果雇主们认为，大学毕业生并不具备通识教育所期望的学生能力。

“雇主们认为的重要能力，其实

与通识教育的目标是一致的。”罗德斯说，令人遗憾的是，调查发现，只有10%甚至更少的大学生被认为拥有必需的重要能力，“这使美国教育界开始反思，研究型大学的通识教育究竟该如何培养学生。”

推行通识教育的另一个初衷是培养年轻人的创新能力，为他们提供创新思维的土壤。

有专家在研讨会上透露，科学家对不同年龄段人群的创新天赋进行测试，结果发现4到5岁的孩子，有98%显示出创新天赋；10岁的孩子，只有30%显示出创新天赋；而15岁时，只有12%的孩子显示出这一天赋；到了30岁的年龄段，具有创新天赋的比例居然下降到了2%。

究竟是什么使那些幼年时有创新天赋的孩子，在受教育的过程中逐渐丧失了天赋？“这要求我们必须重新审视当下的通识教育。”罗德斯说。

当下通识教育面临各种两难

在中国，通识教育虽然只有十多年历史，却也面临着两难困境。

北京大学元培学院院长、哲学系教授李猛最直观的感受是，通识教育需要学术基础深厚的老师参与授课，而通识课程本身的要求和专业规划并不完全一致。他以哲学教育为例说，哲学系的老师如果针对本系之外的学生，开一门面向全校非哲学专业的通识课程，应该如何设计和规划？现有学科体系下，学生

每周的学习时间至少得80小时。如果再增加通识课程，学生大概没有休息时间了，这也是通识教育面临的压力之一。

同时，实践通识教育的学校往往是综合性研究型大学。仅以北大为例，这样一所文理兼有的学校，将理科纳入通识教育的最大问题是，这门课如何对整个大学教育起到核心作用。

近年来，国内不少综合性大学都在推进本科教育改革，某种意义上会加深这一矛盾。所以通识教育最需要充分考虑的，是专业性通识教育之间的矛盾。



表达与交流，是最重要的通识教育

虽然通识教育与专业性之间矛盾重重，但研讨会上，学者们一致认为，通识教育最重要的目标是培养学生的书面和口头表达能力。西安交通大学电子信息工程学院院长、中国科学院院士管晓宏甚至认为：“表达与交流，是最重要的通识教育。”

罗德斯透露，他们在对雇主的调查中发现，在雇主看重的所有能力中，能有效进行口头交流，是排名第一的能力。著名科学家冯·卡门曾经谈到，当年他第一次在办公室见到钱学森，钱学森回答问题时异于常人的精确，让他立即决定“应该招收这样的学生来读我的博士生”。

罗德斯说：“高等教育界的学者已经开始思考，该如何保持学生的创新能力。但在参与多个学校的教育实践后，我们发现，表达能力并不仅仅与信息接收有关，还与理解有关。因为接收消息，并不意味着你理解它。”

他甚至进一步提出，当学生提升了对信息的理解，并且能够和其他人发起讨论时，就会主动寻找并研究相关资料，尤其是作业以外的书籍，进而不断加深对这些知识的理解，甚至将其变为他们生命的一部分。在理解和讨论过程中，学生会获得一种写作的乐趣，直到有一天，感受到一种顿悟，

而这正是创新之光。这才是通识教育应该带给学生的收获。

“书面表达和口头交流能力的缺失，严重影响了学生未来的发展，甚至影响到学者的学术表现。”管晓宏说。

几年前，华中科技大学有位学者的论文被某国际期刊撤稿，就是因为在他的论文中用了一句“hand of the creator”（造物主的神奇之手），这名研究动物肌肉的学者其实只是想表达动物身上所具有的奇妙的完美，恰如电视里的解说词：“这是造物主的鬼斧神工……”，却被编辑认为是科学论文中宣扬宗教。管晓宏认为：“归根到底，他违背了科技论文与学术报告的表达规范，缺少书面表达的训练。”

目前，几乎所有世界知名大学在本科教育中都有大量的写作训练，“写作与表达”被单独列为一门课程。耶鲁大学、斯坦福大学有超过60个学时的写作训练。管晓宏认为，语言的运用能力甚至决定了学生的未来发展。

据复旦大学通识教育中心主任、哲学学院院长孙向晨介绍，目前，复旦九成以上的通识课程都设有小班讨论，希望学生在讨论中提升思辨能力和表达能力。同时，学校正在建立“通识写作中心”，希望由此提升学生的书面表达能力。

